



清代

中俄恰克图边境贸易

米镇波 著

QINGDAI ZHONGE QIAKETU BIANJING MAOYI
南开大学出版社

清代中俄恰克图边境贸易

米镇波 著

南开大学出版社

天 津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清代中俄恰克图边境贸易 / 米镇波著. — 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3.9

ISBN 7-310-01918-0

I. 清... II. 米... III. 中俄关系—边境贸易—经济史—清代 IV. F752.94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033277 号

出版发行 南开大学出版社

地址:天津市南开区卫津路 94 号 邮编:300071

营销部电话:(022)23508339 23500755

营销部传真:(022)23508542

邮购部电话:(022)23502200

出版人 肖占鹏

承印 天津市蓟县宏图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经销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

版次 2003 年 9 月第 1 版

印次 2003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 850mm×1168mm 1/32

印张 5.5

字数 136 千字

印数 1—1000

定价 9.00 元

目 录

绪论	(1)
第一章 恰克图边境贸易的产生及其在波折中的 发展(1840 年前)	(9)
一、《中俄恰克图条约》的签署及俄国为打开中国 市场作准备	(9)
二、乾隆朝三次关闭恰克图口岸和彼处贸易在曲 折中的发展	(16)
第二章 沙俄政府加强对中国的研究和禁止在恰克 图地区鸦片走私的政策	(24)
一、沙俄政府加强对中国的研究	(24)
二、鸦片战争前后沙俄政府在恰克图地区禁止 鸦片走私的政策	(33)
第三章 1845 年尼·柳比莫夫对新疆的秘密考察与 《中俄伊犁、塔尔巴哈台通商章程》的签订	(45)
一、恰克图贸易委员会的建议	(46)
二、柳比莫夫对新疆的秘密考察	(49)
三、柳比莫夫关于贸易问题的报告	(50)
四、《中俄伊犁、塔尔巴哈台通商章程》的签订	(53)
第四章 同治元年《中俄陆路通商章程》之签订与有限 的天津贸易	(57)
一、《中俄陆路通商章程》签订之前的局势	(57)
二、中俄双方就章程内容进行的艰苦交涉	(63)
三、《中俄陆路通商章程》的签署	(72)

四、中俄陆路通商谈判期间的零星陆路贸易·····	(76)
第五章 中、俄文文献中所记载的恰克图城和买卖城·····	(84)
一、恰克图与买卖城概况·····	(84)
二、一份中国商人的守则·····	(88)
三、商人们日常经营与采办茶叶·····	(91)
四、回禄光临难复原状·····	(96)
第六章 同治八年《中俄陆路通商章程》之修订·····	(97)
一、中俄双方就俄方提出的章程修改要点所进行 的交涉·····	(97)
二、中国单方面实行免征俄商天津复进口税·····	(101)
三、同治八年对《中俄陆路通商章程》之修订·····	(104)
第七章 中俄恰克图边境贸易商路概况·····	(108)
一、商路上的情况·····	(108)
二、贸易商路上货物转运情况·····	(111)
三、从福建运茶到恰克图的商路·····	(113)
四、同治年间华商假道恰克图赴俄国贸易·····	(116)
第八章 《伊犁改订条约》与《中俄陆路通商章程》之 再修订·····	(123)
一、左宗棠收复新疆时的西北边境贸易与清政府 对俄外交·····	(123)
二、《圣·彼得堡条约》即《伊犁改订条约》的签订·····	(135)
三、光绪七年改订《中俄陆路通商章程》·····	(139)
四、《圣·彼得堡条约》签订后的西北路贸易状况·····	(142)
第九章 光绪初年俄商偷运砖茶非法倾销蒙古地区·····	(144)
一、清政府以条约限制俄商在蒙古地区贸易·····	(144)
二、清总理衙门对俄商违法行为的核查·····	(147)
三、《圣·彼得堡条约》的签订使蒙古利权进一步 丧失·····	(152)

第十章 对中俄恰克图边境陆路贸易的历史评说·····	(158)
一、三个发展阶段和衰落的原因 ·····	(158)
二、恰克图边境陆路贸易的影响 ·····	(161)
三、晋商的兴起及其他 ·····	(164)
四、恰克图边境陆路贸易和俄国西伯利亚地区 ·····	(167)
五、恰克图贸易还对一些城镇的兴起有重要影响 ·····	(169)
后记·····	(170)

绪 论

清朝初年，中国对俄罗斯的了解是通过蒙古人作中介的，因而是间接的。俄罗斯对中国的了解同样也是通过蒙古人，从蒙古人那儿知道大漠以南有个契丹族。明代来中国的利玛窦在他的《中国札记》一书中，曾辟出专章来讨论这样一个问题，即在莫卧儿王国以东的契丹与中国是不是同一个国家。到了俄国与中国接触的时期，这个疑问似乎已经没有了。因此，俄语中的中国一词发音就是契丹，和英语中的发音不同。随着俄罗斯疆界迅速东拓，清政府对这个北方强邻愈来愈关注。关注的主要原因有两个：一是俄罗斯疆界逼近满族的发祥地中国东北地区；一是俄罗斯加大了对蒙古人的影响，从而引起了满蒙关系的动荡。两个大国的初次接触是以兵戎相见，但是后来这种现象越来越少。^①这是和清政府的对俄政策有关的。这种政策起到了化干戈为玉帛的功效。

纵观有清一代二百几十年，在处理对外关系方面存在着两个体系。早期是朝贡体系，后期是条约体系。这是很多外国学者的看法。实际上并不尽然，历史上两者也有交叉。在对俄罗斯的关系问题上，清政府一开始就是以条约为基础的，尽管处理早期中俄关系

^① 江户时代的日本民族认为，满族人关乃是“华夷之变”。当时的日本人视满族为夷人，视满族人当权为“夷变”。因此，当时日本甚至不愿与清政府打交道。但在俄罗斯方面则完全没有这种“正统观念”。他们一直积极派使团与清统治集团建立联系。

问题的清政府衙门是理藩院。从《恰克图条约》签署到《中俄陆路通商章程》签订、又到后来对该章程多次的修订、再加上原来双方签订的各种条约,终于在1881年,以《圣·彼得堡条约》签订为标志形成了一个完整的条约体系,来保障中俄陆路贸易合法、安全、有序地进行。这是俄国方面世代不懈地加以追求的目标,清政府方面则是处于应对的地位。清政府真正意义上的外交始于清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成立之后。总理衙门提出以《万国公法》为处理对外关系的基础,自我否定了过去的朝贡体系。《万国公法》原名 Elements of International Law,作者惠顿(Henry Wheaton)是美国著名律师,在欧洲担任外交官达20年,1847年回国后任哈佛大学国际法教授。1863年总理衙门因为教案与法国交涉,要求美国公使蒲安臣推荐一部西方国家公认的权威国际法著作,蒲安臣推荐惠顿的著作。丁韪良曾把他的译稿带给崇厚看。崇厚看了很喜欢,说这正是新型外交关系所需的指导书,并表示要把它推荐给总理大臣。蒙王大臣关注,派员校正底稿,出资付梓。^①从此,清政府更加自觉地从条约来约束与各国的关系。这也就是《中俄陆路通商章程》以及《圣·彼得堡条约》产生的背景。

有清一代的中俄关系涉及政治、经济、文化、宗教、边界诸方面的内容。其中,恰克图贸易是双边关系中最重要而研究又相对薄弱的问题之一。恰克图贸易从雍正年间开始,到光绪末年因横跨欧亚的西伯利亚大铁路修竣,而导致该贸易衰落,悠悠岁月跨度几近二百年。在近二百年中,中俄两国政府进行了无数次交涉,两国人民有过无数交往。这是一笔留给中俄两国人民的丰富的历史遗产。史学工作者应该透过感情的藩篱,去挖掘那段历史时期更深层次的内核,从而把睿智和清醒留给后人。对此,我感到责任重大。作为教育部重点社科课题,恰克图贸易研究起码要涉及如下问题:

^① 参见(美)惠顿《万国公法》,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年1月,点校说明、凡例。

1. 恰克图贸易的产生与曲折发展；
2. 第一次鸦片战争之后，沙俄政府为保护恰克图贸易而实行的禁止鸦片走私政策；
3. 沙俄政府把恰克图边贸扩展到新疆地区的努力和《伊、塔通商章程》的签订；
4. 恰克图城和买卖城的概况，双方陆路贸易的商路；
5. 《中俄陆路通商章程》的签订及多次修订；
6. 光绪初年俄商偷运砖茶倾销蒙古地区问题；
7. 《圣·彼得堡条约》签订后陆路贸易的扩大及对蒙古地区的影响；
8. 阿古柏叛乱时期西商假道恰克图口岸赴俄贸易问题；
9. 中俄恰克图陆路贸易的发展阶段，该贸易对中俄两国经济与人民生活的影响，及其走向衰落的原因。

当然，还有一些其他问题，于此不再一一列举了。只有把上述问题搞得相对清晰并深入进行了研究，才能从中得出科学的、符合历史真实的结论。这种科学的结论对现实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

著名学者启功先生曾有一首《贺新郎·咏史》，调侃历史研究在缺乏第一手关键史料时的无奈。现恭录如下：

古史从头看，几千年，兴亡成败，眼花缭乱。多少王侯多少贼，早已全部完蛋。尽成了，灰尘一片。大本糊涂流水账，电子机，难得从头算。竟自有，若干卷……谁考透，这公案。

历史研究面对的是“大本糊涂流水账”固然可悲，若只收集到支离破碎的材料，即使是第一手材料，也还是无法开展研究的。上世纪80年代末，当我把自己搜集多年的资料编排开来时，无奈地发现材料太少，根本无法构筑一个基本的研究框架。寻找史料的路还很长。1992年和1993年，我先后两次只身到莫斯科，终日盘桓

于莫斯科国家图书馆内。在该馆手稿部,我发现了俄罗斯首任驻天津总领事斯卡奇科夫(中文名字孔切契),于19世纪六七十年代写的商务报告,涉及恰克图与天津。报告字迹清楚,笔法娴熟,容易辨认。报告内容量很大。时间不允许我潜下心来阅读、思考和笔录,但我明白,这是块未开垦的处女地;我当尽可能多地搜集。在斯卡奇科夫的个人档案中,我意外地发现了清地方政府为在京杭运河上经营运茶业的商船所发的“船票”,发现了天津一些水运局为承揽茶叶运输业务而签的合同,其内容均极珍贵。接着,我又在莫斯科国家图书馆馆藏部发现了俄罗斯外交部亚洲司副司长尼·柳比莫夫于1846年在圣·彼得堡写的商务考察报告。这一切都增强了我完成一部专著的信心。沙俄时代著名外交评论家维谢洛夫斯基说,柳比莫夫虽然没有留下什么著作,外界也很少介绍他,但他对俄罗斯在远东的外交政策产生过巨大影响^①。既如此,他的19世纪40年代的商务报告就自然价值不菲。这个报告的主要内容有:

1. 1843年上届委员会关于恰克图贸易日志的摘要;
2. 柳比莫夫在塔城和伊宁的商务考察报告;
3. 给西西伯利亚总督的报告;
4. 关于贸易状况的报告(计30页);
5. 考察后的结论。

当沙皇见到柳比莫夫的报告后曾批示:“此建议可采用。”这推动了俄对华边贸从恰克图地区向新疆地区的拓展。

前不久,在中国国家图书馆核心馆藏部,我又找到了1857年在喀山出版的阿·科尔萨克写的《俄中贸易历史资料统计评述》。该书不仅记录了一百四十多年前恰克图贸易的统计数字及相关资料,而且追溯了18世纪该地贸易状况,留下了弥足珍贵的第一手

^① 参见阿·伊帕托娃《图加里诺夫与柳比莫夫的北京通信(19世纪40年代)》,《远东问题》杂志1991年第2期,俄文版。

资料。柳比莫夫的报告和科尔萨克的著述都是用旧俄文写成的，这对我的俄语水平是一次严格的考核。

1991年2月，台湾中央研究院近史所档案馆编辑出版了《外交档案目录汇编》两册，公布了《清朝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清档（1861～1901）》，这特别引人注目。清档其中专设《俄国通商税务》栏目，其下列出大量涉及恰克图边境陆路通商贸易的案卷。蒙台湾中研院近史所前所长陈三井教授的帮助，搜集到了不少这方面的档案。在郑克晟先生的启发下，我曾为此事写信给台湾中研院吴大猷先生，以南开校友的身份请求帮助。那时他还是台湾中研院院长。吴先生以忘年之真情将来信批转给陈三井教授并请他帮助我，使我获益良多。在此，对这位前辈、著名学者的扶掖后学的精神表示由衷的钦佩；对陈三井教授表示由衷的感谢。1994年，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主办的《历史档案》杂志开始陆续刊出由方裕谨先生选编的《清咸丰十一年下半年总署陆路通商清档》（33件）、《清同治元年总理衙门陆路通商清档》（43件），均颇珍贵。大陆和台湾两地所公布的清档，在内容上是互补的，这对全面研究恰克图边境陆路贸易很有好处。2002年春节，美国辛辛那提大学的关文斌教授给了我一个意外的惊喜，他亲自给我带来了数公斤重的“总理衙门清档”。当我见到这些珍贵的档案时，眼泪差点儿掉落下来。对关文斌先生和他的好友范毅军先生的无私支援，我当以学术研究的高质量予以回报，这是一种最好的报答。中文和外文文献、大陆和台湾的档案构筑了本研究课题的基本框架，成为本研究的史料基础。除此之外，还有俄罗斯财政部、俄外交部亚洲司图书馆、西西伯利亚总督衙门档案、东正教驻北京使团神职人员的报告和个人日记、往来信函等资料被本课题研究时所利用。中文方面被本研究所利用的档案文献还有《清实录》、《皇朝经世文编》、《理藩院奏折》、乾隆年间中俄贸易史料，中西合璧的海关册等。

现在来简略分析一下国内外研究状况。俄国方面对恰克图贸

易作了较充分阐述的首推米·斯拉德科夫斯基院士。他是中国问题专家,曾长期在华工作,处理中苏商贸关系问题。他的专业研究方向是中俄中苏经贸关系。1974年,在莫斯科出版了他的《俄中民间经贸关系史(到1917年)》一书。其中作者对恰克图贸易作了深入分析并提出了精辟的见解。斯拉德科夫斯基考察了从1850年到1893年间恰克图贸易的起伏与发展,考察了《中俄陆路通商章程》对恰克图贸易的影响,俄国政府为改变贸易中的俄方入超而在政策上所作的调整等等方面的问题。他对中俄双方边贸关系的认识和理解往往高人一筹。在其后,有俄罗斯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主任研究员阿·霍赫洛夫撰写的多篇相关论文,其中有些被译成英文,收藏在美国胡佛研究所。霍赫洛夫的专业方向是研究17至19世纪的中国社会经济史。他热爱中国,在中国工作多年,在南开大学作过研修,有着很深的汉学功底。在他所发表的相关论文中,最引人注目的一篇叫做《恰克图及其贸易》(18世纪20年代至19世纪中叶)。这篇论文考察了18世纪20年代至19世纪40年代这一百多年中,经过恰克图口岸所进行的边境贸易的过程,反映了这个过程中的历史的真实。霍赫洛夫认为,应该就两国政府对恰克图贸易的政策,及该贸易对两国经济发展的影响等问题深入进行研究。他认为把恰克图贸易研究推向深入的关键,是要把俄文档案和中文档案有机地融会贯通后,再引进到研究中来。阿·霍赫洛夫主任研究员是我的师长,他曾给我很多的帮助。正是在他的指导下,在本研究课题中,我准备把俄文档案和中文档案有机地结合起来,去粗取精、去伪存真,以更好地反映历史的真实。此外,20世纪40年代前苏联出版了西林写的《18世纪的恰克图》一书。该书对恰克图贸易与西伯利亚人民生活的关系,作了较细致的分析。1978年,前苏联乌兰乌德市出版了科·帕夫洛维奇的《恰克图城》一书。另外还有不少有关恰克图贸易的论文。总的来说,俄罗斯史学界对恰克图边境贸易的研究远远超过了中国史学界。

我国史学界关于中俄经贸关系的论著,从20世纪初以来便不断出现。自二三十年代开始先后有王之相的《中俄陆路通商关系之历史上变迁》、赵泉澄的《俄领事〈新疆商务报告〉之发现》、刘选民的《中俄早期贸易考》、陈复光的《有清一代的中俄关系》等研究成果问世。其中,陈复光提出的“俄廷主旨,仍在扩张商务,始终未尝放弃其对华之友好政策”的观点,在今天看来,仍值得研究者认真思考。1949年以后,这方面的研究论著计有:黄定天《尼布楚条约之前俄国对华贸易初探》、徐昌汉《关于尼布楚商队贸易》、蔡鸿生《“商队茶”考释》、陈钧《十九世纪沙俄对两湖茶叶的掠夺》、樊树志《从恰克图贸易到广州“通商”》、赵春晨《〈伊塔通商章程〉是中俄关系史上第一个不平等条约》、黑龙江社科院历史所《中苏经济贸易史》等^①。1985年3月6日,《光明日报》第3版刊出张正明的《清代的茶叶商路》。1993年第5期《近代史研究》杂志刊登了米镇波的《1846年柳比莫夫对新疆的考察和伊、塔通商章程的签订》一文。^②论文方面对恰克图贸易研究有所推动的,还有郭蕴深的《论中俄恰克图茶叶贸易》、宿丰林的《试论中俄早期恰克图边境贸易的历史地位与作用》等。几十年来,中国史学界对中俄边贸关系研究的推动是缓慢的。原因是对几百年来中俄关系史的偏激观点妨碍了研究的客观性和学术进展。

在著述方面,虽然没有专门著作问世,但不少阐述清代经济、商贸关系的专著,都要涉及恰克图边境陆路贸易。其中比较典型的计有:一、袁森坡等《康雍乾经营与开发北疆》,该书在“中俄贸易与买卖城”的小标题下,考察了自明末到乾隆中后期清政府对西北地区的开发,简述了中俄贸易从北京贸易到边境贸易的演变过程,叙述了自雍正五年(1727)中俄双方划定恰克图为边境贸易区后,双

① 参见黄定天《二十世纪的中俄关系史研究》,《历史研究》1999年第4期。

② 1994年《近代史研究》又载文对米镇波的学术观点予以批判。

方贸易的大致情况以及该贸易对俄罗斯的重要意义；二、郭蕴静著《清代商业史》，该书在“对俄贸易”标题下，简述了恰克图贸易及其重要性；三、张海鹏、张海瀛主编《中国十大商帮》，葛贤慧著《商路漫漫五百年——晋商与传统文化》，这两部书都在叙述山西商人时论述到恰克图贸易，主要是研究山西商人和恰克图贸易的关系。其他的著述恕不一一列出。

综上所述，中俄边境贸易史，特别是恰克图地区贸易史应该向更深的研究层次推进。

最后，我还要谈及写作的手法。作为教育部重点课题，作为一部专门的史著，确实存在着一个如何叙述的问题。写作手法应服从研究的目的，要用一种朴素平和的叙述来衬托出史料的魅力；史料的魅力来源于按照科学的方法排列对比，加以鉴别，去粗取精、去伪存真，全心全意于求真求全，而不在于猎奇；在这样的基础上，平铺直叙，讲透一个问题，推进一分研究；取一种老实交待的方式，决无渲染之嫌。历史研究要科学地解释历史，科学的本意就在求实，如是才能应答现实，昭示未来。

第一章 恰克图边境贸易的产生 及其在波折中的发展

(1840 年前)

关于清朝的对外贸易是个很大的研究课题。谈到清朝对外贸易就先要谈到恰克图贸易,因为这是一个开办最早、历时最久、中俄双方均非常重视、并由边境深入到内陆地区进行的贸易。本章准备详细追述一下恰克图贸易的由来,以使所论述的问题显得更加完整。

一、《中俄恰克图条约》的签署及俄国为打开中国 市场作准备

《尼布楚条约》签订前后的中俄关系是本课题研究的起点,因为它与《恰克图条约》签订关系密切。

法国学者加斯东·加恩的《彼得大帝时期的俄中关系史》一书是研究 1689~1730 年中俄关系的最重要的专著之一。该书对 17 世纪中俄双方的早期接触有过如下概括:“在整个 17 世纪,俄国穿越西伯利亚,一直推进到了黑龙江流域。在 17 世纪中叶,它似乎已经在外贝加尔区建立了固定的居留地,即市镇或修道院。这样,它就与截然不同于西伯利亚西部和中部游牧民族的邻邦中国,面对面地相遇了。它马上就与它的邻邦进行外交的和武力的接触。莫斯科曾两次派遣使臣到北京来。一次是巴伊阔夫,他于 1656 年 3 月 3~13 日到达北京,同年 9 月 4~14 日才离开;另一次是摩尔达

维亚人尼果赖,于1676年5月15~25日到达中国首都,并停留到1676年9月1~11日。”^①关于摩尔达维亚人尼果赖,全名为尼古拉·斯帕法里,《清实录》有如下记载:“其使臣尼果赖不娴典礼,不便给与敕书,应令理藩院谕来使云,尔主欲通和好,应将本朝逋逃根忒木尔遣还,另简使臣遵中国礼行,方许照常贸易。从之。”^②斯帕法里前往中国所接受的指示中有一条,即请求中国允许两国商人自由往来于双方国境。加恩的概括不过是择其要者而言,其实,在这两次出使之间的二十年间,俄方还曾派出由布哈拉人谢·阿勃林率领的官方商队到北京来。从17世纪初到《尼布楚条约》签订,中俄双方已有了相当频繁的正式交往和较密切的地方贸易关系,后者主要在黑龙江流域及外贝加尔地区。中国商人通过鄂温克人和蒙古人把商品运往雅克萨和尼布楚。那里有许多俄国人大量收购这些货物,并将这些货物运往西伯利亚,再运往俄罗斯欧洲部分。这样“尼布楚在17世纪70年代就成为俄中贸易的基地,当时那里曾为买卖中国货物的商人修建了专用的商场”。^③这种贸易关系是边境的、地方的贸易关系,与国家无关,并没有得到国家的认可。17世纪末中俄东北边境上的雅克萨之战引起了朝鲜的关注。清政府能否打赢此战关乎清王朝在朝鲜人心目中的地位,若失败了,则俄罗斯的影响会大增。1689年,中俄双方在平等的基础上签订了中俄《尼布楚条约》,保障了黑龙江和乌苏里江流域的和平与安宁,遏止了沙俄继续东进的势头,对维护远东地区的和平与秩序起了良好促进作用。《中俄尼布楚条约》第五条规定:“两国今既永修和好,嗣后两国人民和持有准许往来路票者,应准其在两国境内往来贸易。”这是双方第一次以国家的名义正式承认边境贸易为合

① 加恩:《彼得大帝时期的俄中关系史》,商务印书馆1980年,第1页。

② 《清实录·圣祖实录》(一)卷62第799页,中华书局1985年。

③ 弗·伊·奥戈罗德尼科夫:《17世纪阿穆尔河当地人和俄罗斯人的农业》第64页;普·季·雅科夫列娃:《1689年第一个俄中条约》,商务印书馆1973年,第116页。

法。这便为中俄交界的东部地区边境贸易创造了友好气氛,为这种互利贸易的发展奠定了基础。1689年11月,《尼布楚条约》甫一签订,沙俄政府即发给俄国商人来华贸易的证书。12月,由菲拉季耶夫、鲁辛、乌沙科夫和尼基京四家俄国巨商的代理人组成的商队从尼布楚启程,经额尔古纳堡前来嫩江。直到1703年这条路线是俄商来华的主要商路。1690年居住在莫斯科德国侨民区的德裔荷兰人伊兹勃兰特·伊杰斯向彼得大帝恭呈一幅由他本人绘制的东北亚地图和一个建议经过里海发展与波斯、经过西伯利亚发展与中国的贸易的计划。这个建议得到沙皇的垂青与首肯。1692年伊杰斯怀揣敕书启程,开始其中国之旅。其主要使命之一是了解康熙皇帝对《尼布楚条约》的反应,了解中国各种货物的买卖和纳税,及何种商品来自何处等情况。

据统计,《中俄尼布楚条约》签订之后运往中国的俄国货物量有了很大增长。1690~1691年运往俄罗斯的中国货物总价值计为14473卢布,1691~1692年已达23951卢布,1693~1694年则达50686卢布。^①尼布楚成为中俄双方边境贸易的一个据点,自然是由于当地民众生活的需要,它是以俄罗斯境内东西伯利亚地区丰沛的自然水系为依托的。选择这么一个遥远的地方作为贸易点,也和当时通往中国的贸易商路尚未被更多地发现、被开拓有直接关系。中国文献上的记录表明尼布楚地区的贸易状况平平。“黑龙江省地邻俄罗斯,自康熙二十八年立碑分界后,每年派官兵巡查边境。因各以土产交易、无远省之商、无难得之货,亦未尝专派大员督理。盖与会宁、中江、都市同为市易之小者,故其事不甚著。”^②因

① 参见谢·弗·巴赫鲁申《学术论文集》第3卷第1分册,莫斯科1955年版,第156页;普·雅科夫列娃《1689年第一个俄中条约》;亚历山德罗夫《1689年尼布楚条约前俄中经济关系史的一页》,载《苏联历史》杂志,1957年第5期,第207页。对这一阶段研究的论文还有黄定天的《尼布楚条约之前俄国对华贸易初探》。

② 何秋涛:《俄罗斯互市始末》,(清)王锡祺辑:《小方壶斋舆地丛钞》第三帙,杭州古籍书店,第189页。